

“先推后拉”:流动青年的主动相亲及个体化策略研究

■ 胡艳娜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主动相亲实践的案例研究,力图呈现流动青年的自主性亲密关系策略。研究发现,受制于文化和制度因素,流动青年经历了“排斥—理解—接受”的心路历程,在不断推拉、说服自我的过程中接纳了相亲形式。在相亲前、中、后期,他们积极采取“先推后拉”的个体化策略,通过与相亲对象的沟通协商完成利益结构互补。流动青年所采用的“推拉式”亲密关系策略并非只是扩大了个体自主性,同时还维护了代际和谐与他人利益。

【关键词】 流动青年 个体化 相亲 亲密关系

个体化时代,年轻人追求以自由为内核的亲密关系,“相亲”被戏称为“老派做法”。但是根据《2022—202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70后”-“00后”“三观”洞察》的数据,我国相亲人群平均年龄正在逐渐降低,从“70后”的男性26.4岁、女性25.4岁降低至“00后”的男性20.6岁、女性20.2岁^[1]。从当前社会现实来看,进入“相亲浪潮”的年轻人并不鲜见,这种矛盾现象有趣地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亲密关系时的挣扎与困惑。

现有研究从文化和制度性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化时代青年面临的亲密关系困境。一方面,代际间固有的文化冲突和隔膜导致两代人在择偶观念、婚恋模式等亲密关系议题上的看法迥异^[2]。另一方面,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化的亲密关系^[3]。部分中国青年面临着一定的婚恋焦虑与婚恋压力^[4],并呈现出双重性的矛盾婚恋观念,他们既追求独一无二的浪漫爱情,又认为基于激情而非物质建立的亲密关系不够稳定^[5]。同时,媒介技术催生出的线上交友平台将青年复杂的情感需求异化为简单的数字符号^[6],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依旧困难重重。

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强调文化和制度性力量对青年亲密关系的影响,进而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该群体的无奈与心酸,但微观层面关于个体自主性的讨论较少,忽视了青年的主观经

收稿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胡艳娜,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性别。

验。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流动青年的主动相亲实践入手,探讨青年如何在亲密关系的建构和维系上展现自主性,进而丰富对中国青年个体化过程的理解。

一、中国式个体化下的青年亲密关系

(一)青年的亲密关系与自主性

从广义上来说,亲密关系包括家人、恋人、夫妻及朋友关系,但根据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者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其核心议题大多围绕情爱展开^[7]。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亲密关系,即基于情爱婚恋的两性情感关系,因为这是亲密关系中最常见与最基本的形式,其他亲密关系大多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延伸。

目前,青年在亲密关系上面临着一种矛盾意向,即个体在亲密关系里因无法兼容某些角色或无法回应某些期待所引发的矛盾情感、态度及行为,以及结构性限制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冲突^[8]。一方面,尽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传统已被消除,但当今青年在事关“婚恋嫁娶”等人生大事的议题上依然要与父母商量。由于两代人价值观的不同,一旦子代高举婚恋自由的“大旗”,总是会遭到来自亲代“不懂事”“不负责任”“白眼狼”的谴责^[9]。以相亲为例,过往关于“相亲会”^[10]“相亲角”^[11-12]以及“白发相亲”^[13]的研究,探讨的大多是代际之间在相亲议题上的差异和矛盾,强调亲代介入子代的择偶和婚恋,青年群体无法完成个体化,成为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边际人”^[14]。例如,有学者通过对“相亲角”的研究发现,求偶青年很少露面,都是父母代替子女采取择偶步骤和择偶策略^[15]。另一方面,传统集体主义社会下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普遍地表现出对两性纯粹关系的想象和向往^[16]。尤其是当他们流动到大城市,接触到城市文化之后,该群体开始追求个体化的亲密关系实践,希望拥有浪漫爱情,自由进行婚恋^[17]。可一旦强调物质条件的交换,流动青年在构建两性亲密关系上便很难占据优势。经济压力、发展前景的挑战等成为流动青年在相亲市场上的掣肘因素,无法满足他们对于美满婚姻的梦想和追求。另外,通婚圈内性别结构失衡^[18]、高价彩礼^[19]等现实因素也使得流动男性青年在相亲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线上交友平台的出现也并未提高流动青年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和效率。孙萍等人发现,网络相亲伴随着阶层、地域、年龄等诸多结构性的不平等,基于对品位、学历、户籍和经济条件的要求,越来越多自身条件相对较弱的人被排除在媒介化交友之外^[20]。

以上研究启发我们从相亲在观念与机制上的差异与变化来全方位理解流动青年如何建立与维护亲密关系,但存在两重局限。第一,过往研究将部分青年描述为代际鸿沟或城乡差异里消极被动的相亲“受害者”,缺乏对青年主体性的考察。第二,这些研究缺乏过程视角,往往仅聚焦于相亲前期,即“人们如何在线上或线下寻找相亲对象”,对于开展相亲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的刻画相对较少,对于青年找到心仪对象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建立进一步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将从中国式个体化的双重性入手解读流动青年在建构亲密关系时面临的矛盾,挖掘他们维持和扩大个体自主性的可能性。

(二)中国式个体化的双重性

个体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之一。如今中国青年生活在由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持续增

长的个人风险和强调亲密与自我表达的文化所构成的后现代大环境之中,个人主义和自由奔放成为描述中国青年时最常见的形容词^[21]。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活法”(a life of one's own),自由选择如何度过人生,以此展现自己的生命轨迹;但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认为,个体化时代需要解决的是个体化社会如何整合的问题^[22],而在中国,个体自主性需要在与集体的不断协商中获得^[23]。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个体化具有双重性,表面上看起来个性化的自由生活方式,实际上依然受制于文化和制度因素。

从制度性角度来说,个体化行为必须限制在国家、劳动市场等制度规定的范畴之内。同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个体的自主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社会和制度塑造的产物,霍特曼等人^[24]将这一现象称为被制度塑造的“社会化”自我和反抗压制的“本真性”自我。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从总体走向分化,国家鼓励农民流动到城市,走上个人奋斗的个体化道路,单独的个体而非家庭成为基本社会生产单位。可见,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给了人们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的权利^[25]。但实际上,自由随性的中国青年依旧被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等环境所限制,并迫使其舍弃欲望和惯习,按照某种规则行事,制度与本真性自我的张力更为凸显。

从文化性角度来说,西方个体观的前提为每个人生来便是独立存在的权利主体,这在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26]。于是,关系化的个体中存在一个分裂的自我:以个体利益为中心定义的“小我”,以集体利益(家庭、亲族)为中心的“大我”,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小我”往往要服从“大我”,这说明中国的个体存在于多重人际关系之中,离开了道德化的共同体,个体的自主性便很难存在^[27]。

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中国式个体化的双重视角,将相亲这种游离于自由与传统之间的青年亲密关系行为与宏观的制度、文化联系起来,关注流动青年主动参与相亲的实践过程,探究主动参与相亲实践的流动青年如何在主观层面维持和扩大自身的自主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材料。2021年4月-2023年9月,笔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并追踪了芜湖市N县流动青年主动相亲的完整经历,包括初始如何结识相亲对象、过程中如何与相亲对象聊天互动、最后相亲结果何以成功或失败,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主动相亲行为也和流动青年在流入地的处境密切相关。于是,笔者将上海市作为扩展调查地,原因在于上海市是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加上同处于长三角地区,地理位置较近的优势使得上海市成为N县青年向外流动的首选目标。在充分解析工作和生活上海市的N县流动青年的主动相亲实践后,本文利用“滚雪球”的方式,将访谈对象来源扩展至包括北京、广州、武汉、合肥在内的其他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以使得研究数据达到理想的饱和状态。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均为年龄在20-34岁之间的流动青年,共有24名被访者,其中15名女性受访者年龄为25-30岁,9名男性被访者年龄为23-34岁(如下表所示)。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编号	年龄	性别	受教育水平	流入地	主动相亲次数	目前情感状态
S1	26	女	硕士	上海	1	恋爱中
S2	27	女	本科	上海	3	单身
S3	26	男	本科	上海	4	恋爱中
S4	27	女	专科	上海	3	已婚
S5	30	男	本科	上海	4	单身
S6	27	女	本科	上海	3	已婚
S7	27	男	本科	上海	4	已婚
S8	26	男	本科	上海	3	恋爱中
S9	26	女	硕士	上海	2	单身
S10	34	男	本科	上海	5	单身
S11	26	女	硕士	上海	2	单身
S12	27	女	硕士	上海	2	已婚
S13	24	女	本科	上海	5	恋爱中
S14	32	男	本科	上海	5	单身
H15	27	男	本科	合肥	4	已婚
H16	26	女	本科	合肥	3	恋爱中
H17	29	女	本科	合肥	4	单身
H18	27	女	本科	合肥	2	单身
H19	28	女	本科	合肥	2	已婚
G20	27	男	专科	广州	2	单身
B21	23	男	本科	北京	2	单身
B22	28	女	硕士	北京	7	单身
W23	26	女	硕士	武汉	3	恋爱中
W24	25	女	本科	武汉	4	单身

三、主动相亲：“排斥—理解—接受”的心路历程

(一)排斥相亲

中国传统婚姻风俗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抹杀男女双方意愿的同时，漠视了个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也消解了自由恋爱的可能性。自西方婚恋自由的思想引入之后，中国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包办婚姻才受到严厉批判^[28]。以上述发展视角看中国婚俗的流变过程，传统婚姻为媒人牵线搭桥的相亲婚姻，现代婚姻为自由意志主导的爱情婚姻^[29]。

考虑到相亲和传统长久以来的相互“捆绑”，生活在大城市、强调个人权利和意志的流动青

年难免会对这种婚恋形式产生抗拒情绪。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该群体一开始排斥相亲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传统文化已经刻蚀于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中,青年会自觉将光棍、剩女和相亲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找不到对象才会借助相亲”,这是对个体自我价值的一种否定;二是接受了大城市现代性文化熏陶之后,他们下意识地认为相亲是“老古板”的代名词,与自身形象不符。访谈过程中发现,流动青年有时没法接受生活工作在大城市的自己看似摆脱了乡土社会,实现了阶层跃升,可到头来依然要靠相亲完成婚恋。他们渴望追求自由选择的亲密关系。在H16看来,“以前我觉得相亲就是很传统的,像电视剧里演得那样,双方父母带着自己的子女见面,把物质条件都摆在明面,看看合不合适。合适就定下来,不合适就算了。”

(二)理解相亲

然而,当流动青年逐渐到了社会秩序所认可的适婚期时,他们处于单身状态,不仅自己着急,父母也同样着急。由于亲代和子代一致的焦急情绪,青年们往往可以理解父母、亲戚为自己介绍对象的急迫心情,并且他们也会积极通过朋友、交友平台寻找另一半。

大学毕业第一年,父母说刚毕业不着急,第二年稍微问一下怎么还没有对象,第三年都快疯了。后来他们一直在给我介绍对象,我挺能理解他们的,因为我自己也急啊,身边像我这么大的,都谈了好几次恋爱了,我一次恋爱都没谈过。(H15)

倘若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无意婚恋、有意单身时,他们也不会直接与父母挑明。既有研究认为,部分中国青年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享受父母的帮助,却逃避履行责任^[30]。但本文的访谈资料显示,个体化进程中的青年虽然强调自由,可文化规范和家庭情感对他们来说依然十分重要。就情感视角而言,流动青年往往可以理解老一辈催恋催婚的心态,本研究中的流动青年为了让生活在老家的父母安心,他们大多数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不要和父母在这种事情上起冲突、伤了感情”,从而并不排斥亲代介绍相亲对象的行为,以呈现出“孝顺父母”“有责任心”“为父母考虑”的道德个体形象。访谈对象H18刚结束一段7年长跑的恋情,目前她很享受独自生活在合肥的自由轻松感,谈及为何能理解分手后母亲立马介绍相亲对象的行为,她说:“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直很希望我能早点恋爱结婚,有一个自己的家。我能理解她的心情,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和她吵架伤了我们的感情,所以随她去吧。”

从工具性视角来看,本研究也发现,亲代常常用“结婚了就给你买车买房”的物质奖赏“劝诱”流动青年进行相亲。过往研究指出子女接受父母对自身择偶过程的干预,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父母向下流动的物质资源中受益^[31]。只要找到另一半,就能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和回报,流动青年往往“屈服”于亲代的物质“诱惑”,进而听从他们的相亲安排。

(三)接受相亲

如果说流动青年“理解相亲”是一种“交代”,带着点不情愿的情绪,那么到最后“接受相亲”则完全是个人意愿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被赋予自由性的相亲和流动青年找对象的需求不谋而合。一方面,现在的相亲只为男女双方提供了一个认识彼此的渠道,后续如何发展全凭当事人的意愿。本文的访谈对象都以“认识一个朋友”的心态积极开始一段相亲,用S14的话来说,“我觉得相亲和自己谈恋爱没什么差别,都是两性相遇然后慢慢接触和发展。”

另一方面,流动青年远离家乡,父母在老家、同事无法深交、好朋友离得远等现状,促使他们

希冀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能有一位互相信任、体贴的伴侣。但是流动青年狭窄的社交圈无法满足其自由婚恋的需要,访谈对象大多都以“靠我自己是找不到对象了”来自嘲,这导致他们依靠相亲婚恋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流动青年对于相亲持积极接受的态度。除了朋友介绍和借助交友平台之外,他们更接受和相信父母介绍的对象,因为亲代会看重男女双方物质条件的匹配性和地理位置的相近性。

我之前的恋爱都是因为老家不在一起,两个人没法回一个地方就分手了。现在家里人一般都会介绍老家相近的人,地域上的匹配度更高之后,我觉得也许这样两个人的感情会更稳定和持久一点。(B21)

在阐释流动青年主动相亲的心态发展历程时,大部分受访者对相亲都持有“理解”“接受”的积极态度,这与我们的认知形成较大的反差。如果从进步观的视角来看,流动青年放弃自由婚恋甘愿回归相亲婚恋,正是表明他们屈服于集体化伦理,缺乏主体意识。但研究发现,表面上流动青年对相亲“排斥—理解—接受”的心路历程是亲代权威和乡土伦理的延续,但实际上是以青年个体为核心推进的现象,他们理解和接受相亲,是希望保持良好的代际关系、促进家庭共同体的和谐,同时也是在权衡个人利益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四、流动青年的相亲过程与个体化策略

尽管现代相亲已经摒弃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外衣,但其背后所隐含的“阶层内婚制”“传宗接代”等传统伦理观依然制约着流动青年。然而,该群体在相亲过程中也在积极回应自己的个体身份,他们不断修正现有文化和传统的约束,以确保在相亲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一)“扬长避短”:相亲前的自演与助演

一般来说,提前挑明男女双方的经济条件和学历背景已是心照不宣的相亲流程之一^[32]。生活在大城市的流动青年在正式相亲前,会计算自己和相亲对象的家庭条件、个人条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匹配度,当匹配度较高时,他们才会同意相亲。当然,该群体清楚相亲对象也会如此考量自己,因此为了跨进相亲的第一道门,他们往往会选择性地展示自身条件。

户口和房子是流动青年相亲时逃不开的“两座大山”,该群体面临着不被流入地户口制度所接受的困境,子女教育、生育保险、养老保险一直拷问着他们的自尊^[33]。对于这种敏感话题,流动青年往往刻意不谈。34岁的S10近几年经历了事业的巅峰与谷底,目前他从事自由职业,在拳击教练和龙套演员之间来回跑。在相亲前交换自身条件时,他很少提及如今窘迫的经济和工作状况,而是尽力突出自己的外表和过去辉煌的职业经历。

但流动青年“避实就虚”的策略并不总是可行,当仅凭自己的表演无法达成“扬长避短”的效果时,他们往往会和媒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式表演”^[34]。在相亲过程中,媒人成为流动青年个人条件达标表演的“同盟”或“助演”。这意味着,介绍两人认识时,媒人会帮助个人条件略微有“瑕疵”的一方“打掩护”,比如经济条件不好的,他们会说这个人老实;年纪偏大的,他们会说这个人能赚钱;家里兄弟姐妹多的,他们会说这个人勤快负责。总而言之,用硬性条件掩盖软性条件的不足,用软性条件弥补硬性条件的漏洞,这是作为合谋者的媒人惯用的“伎俩”。有了

媒人的帮助,在相亲前,流动青年对个人情况的展现便能勉强过关,如此得到相亲的“入场券”。

(二)维护自我权益:相亲中的拉扯与周旋

1.“关闭朋友圈”:加微信后的区隔与隐藏

随着相亲过程的深入,流动青年会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具体而言,“交换微信”是相亲推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当两性流动青年经过相亲前的简单了解和条件评估之后,倘若认为差不多适合,双方便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即交换联系方式。尽管加微信的初衷是互相了解,深入判断彼此是否合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展示私人生活。相反,纵观访谈对象的相亲实践,研究发现,不少流动青年加上相亲对象微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朋友圈的可见性,要么将朋友圈设为“三天可见”,要么直接“不让他看自己的朋友圈”。两个还未见过面的流动青年连“熟悉的陌生人”都算不上,他们此前不了解彼此具体的人格品性、也不确定彼此的整体契合度,甚至不知道对方真实的身高、长相。经访谈发现,加微信后简单聊几句就“夭折”的案例不在少数。因此,“修改朋友圈的可见性”这一策略可以看作是流动青年的一种防卫措施^[35],传达出“没必要让‘流水’的相亲对象了解我的生活”(S2)的防卫意味。

更有趣的是,流动青年担心自己在大城市真实的生活面貌被相亲对象“出卖”,所以在交换微信的初期,他们会将相亲对象先区隔在朋友圈之外。在他们看来,这些由老家亲戚朋友介绍的相亲对象属于“敌军阵营”,彼此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所以不宜在其面前展露太多的私人生活,否则就会被这些“敌军”窃取,转头告诉家里长辈或中间人。S5就曾经吃过大亏,“相亲对象把我偷偷去海事学校培训的事情告诉了介绍认识的中间人,这就等于告诉了我父母,最后我和父母爆发了严重的争吵。从那以后,但凡加上相亲对象的微信,刚开始我都不会让她们看我的朋友圈了”。

2.“尽快见一面”:个体时间的强调与保护

研究发现,流动青年在推进相亲流程时,从加微信到见面,不会间隔太久。谈及原因,访谈对象大多都回答“不想浪费时间”。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时间紧迫,每日的安排可以精确到小时甚至分秒^[36]。流动青年则是最容易产生时间焦虑感的群体之一,他们正在面临着激烈的工作竞争、巨大的生活压力,大城市高消费、高房价使其挣扎在生存边缘。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他们难免会通过挤压休闲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以勉强保留一个“光鲜”的城市人形象^[37]。基于此,这类群体不会花太多时间和相亲对象在微信上聊天,考虑到线上聊天的隐匿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更希望加上联系方式后,双方能尽快见一面。大多数受访者都强调见面的重要性,只有面对面交流才能了解对方真实的面貌,以方便评估是否要继续下一步。

微信聊了几天之后,我就提出要不要见面,我不太想一开始就把时间放在微信聊天上,文字语音都是没有感情的,无法全面了解彼此。见面的话,可以从对方的言谈举止看出他的性格,会更加真实。(S6)

甚至有访谈对象直接用“浪费”一词形容还没见面之前的网络聊天,29岁的H17自大学毕业后,有过数段主动相亲的经历,“刚开始我还耐着性子和对方聊天,经过几次‘见光死’之后,我都感觉自己的时间白瞎了。现在就是加上微信后先赶紧约个时间见面,大家工作都挺忙的,就别互相浪费时间了。”

从加微信到见面的时间一旦被缩短,便意味着流动青年的相亲过程也随之加快了。在决定时间分配时,他们实施挤压相亲过程的策略,高效快速推动双方相互了解的进程,实现个体对自己时间的保护。

3. 从餐厅到公园:见面空间的协商与转变

在观察和访谈中,本研究发现流动青年关于和相亲对象的见面空间,也有自己独特的安排策略,具体概括为协商与转变。

一般而言,流动青年和相亲对象大多都生活工作在同一个城市。因此,在选择见面地点时,考虑到大都市高昂的出行时间成本,他们通常会协商出一个“距离中间地带”,以同时方便彼此。另外,关于具体的就餐空间,即两人见面吃什么这一问题,访谈对象大多表示自己会发挥自主性,主动选择好餐厅再询问对方意见。协商“吃什么”这一行为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昭示着流动青年的自主能动性,他们可以遵从本心,选择自己最想吃的食物,这提醒他们在相亲过程中拥有饮食选择的权力,而不是成为相亲流水线上被动的个体。访谈对象S14几次相亲经历里,都是他确定的就餐空间,“有一次吃的是希腊菜,是我选的,因为我对那边比较感兴趣,她也想尝试一下不同的食物风格就同意了。还有一次吃的是粤菜,也是我选的,因为我之前生活在广州,我比较喜欢吃粤菜。”

当然,流动青年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地点也并不总是在餐厅这一封闭空间。不少访谈对象认为,吃饭是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尤其是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要面对面吃饭,为了避免互相沉默的尴尬局面,他们会选择只在公园散散步。开放性空间的活动范围更大,用S12的话来说,“在公园散步更自在一些,就算我们两个人没话题可聊,至少还可以聊聊花草植物,或者风景。要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吃饭,两个人面面相觑的场景想想就尴尬。”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开放性空间没有金钱成本,因此将见面地点从餐厅转变为公园,是男性受访者会经常使用的策略。既有研究认为,传统性别化脚本规定亲密关系里的金钱意义由参与公共生活的男性赋予,他们是经济交换的主体^[38]。一言以蔽之,相亲男女出去吃饭时,为了顾及“脸面”,男性往往是主动结账的那一方。大城市的饮食费用本就不菲,男性流动青年是否有能力支付不说,相亲如流水,如果他们屡次三番都要为失败的见面买单的话,难免会生出“冤大头”的不平衡心理。

以前和相亲对象见面我还会找一个比较正式的餐厅,可以充面子嘛。但见面也没成,每次我都要付钱,感觉没什么必要。后来再和相亲对象约见面,我都说不吃饭找个公园逛逛,我是不想浪费钱了。(S7)

(三)避免接触:相亲结果的默认与告知中间人

基本上相亲男女只要见上一面,就能确定是否有继续了解的必要。倘若流动青年发现自己与相亲对象不适配,他们不会直接告知对方,而是委托“媒人”(家人、朋友、同事等)代为转达。翟学伟在解释中国社会的“脸面”问题时指出,是否有面子不在于主体知耻与否,而在于别人有没有给面子^[39]。流动青年将“不合适”的相亲结果告知中间人而非相亲对象,一方面是害怕拂了相亲对象的面子,另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直接拒绝行为会在对方那里落下“把柄”,到头来让中间人为难。尤其是不少流动青年的相亲中间人来自乡土社会的家人朋友,面子是关系的体现^[40],这些

人的面子一旦被折损,将会影响流动青年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代际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感觉这么直接和小姑娘说挺尴尬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记得当时告诉了我姨妈,是她介绍我们认识的,由她来说应该会比较正式和妥帖吧。”(S8)

有意思的是,当流动青年和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后的感觉不错、有进一步了解的余地时,他们反而不会告知中间人这一积极的相亲结果,而是小心翼翼地给相亲对象发信息,内容大多为日常聊天的话题。该行为可以看作不好意思的流动青年们对相亲结果的试探,即以避免直接询问的方式窥察对方的态度,如果对方积极回复,则意味着双方“有戏”,而不回复或言语冷淡,便说明对方“无意”,昭示着相亲的失败。无论何种告知相亲结果的方式,流动青年们都以避免直接接触的方式保护了自己与相亲对象的面子,这种防止陷入尴尬境地的方式体现了自我能动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中国式个体化的双重性视角考察流动青年的主动相亲实践,指出在制度和文化的束缚下,该群体进入相亲场域之前和相亲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然而,通过“推拉式”策略,流动青年在两个维度上进行推远和拉近,以试图维持和增强个体自主性。

(一)与本真性自我的推拉

本真性指个体享有真正的自决和道德完善,它表现为对真实自我的彰显^[41]。本文认为,流动青年主动进入相亲场域的同时,也推远了他们与这种本真性自我的距离。这种推远一方面来源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农村人进入大城市通过个体努力助推生产力发展,但流动青年依旧面临着和传统农村人同样的婚恋困境,即难以自主结交合适的异性,最终不得不求助于相亲^[42]。另一方面,推远则来源于城市生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流动青年想象着大城市的浪漫爱情,拒斥乡土社会的传统婚恋,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增大,他们看清了“有情饮水饱”的脆弱易碎,反而会羡慕传统婚恋方式的稳定和安逸。

不过,在这种推远中,恰恰蕴含着拉近本真性自我的无限可能性。牵线搭桥后强调自由交往的现代相亲模式是重要的“拉动”力量,其赋予流动青年开始和结束一段亲密关系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他们能从传统相亲的陈规和要求之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实现自我同一性。另外,本真性自我也可以在共同体关系中实现,该群体主动进入相亲场域符合亲代对子代尽早成家立业的期待,对父母的情感性顺从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利集体的价值感和安全感^[43]。既有研究曾批判当代部分青年过于关注自己、忽视他人,尤其不再顺从长辈,导致了孝道衰落的道德危机^[44];但本文所关注的这类流动青年,他们自觉形成以孝顺父母为归属的情感意义世界,尽力减少和亲代在婚恋话题上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理解、体贴父母的苦心,信任、尊重父母的相亲安排,确认自己是对亲代养育之恩抱有敬畏之心的道德个体。

(二)与相亲对象的推拉

本研究认为,流动青年在相亲过程中十分擅用“先推后拉”的试探之术,通过不断修正和协商现有文化和制度的约束,使自己在相亲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具体而言,正式进入相亲场域之

前,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青年为了规避因缺少象征资本而面临的身份劣势,他们以选择性展演的方式达到自我价值的宣扬,以一种主导性的姿态获得相亲的“入场券”。相亲伊始,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保护,流动青年将陌生的相亲对象区隔出自己的朋友圈,使其远离自己的私人生活。然而,当相亲继续推进时,流动青年希望双方尽快见面,通过挤压相亲过程的方式先高效快速地拉近与相亲对象的地理距离。在后续见面空间的安排上,无论是协商出一个“距离中间地带”,抑或选择开放性空间,都意味着他们企图找到一个适合双方聊天、了解彼此的地点,以拉近与相亲对象的心理距离。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认为,流动青年的相亲策略虽然表现出高度理性化和工具化取向,但这些行动策略具有“一荣俱荣”的特征,能够实现部分双赢的结果。无论是强调个体时间,还是协商、转变见面空间,抑或间接告知相亲结果,都同时保护了双方的自我时间,也减少了彼此陷入尴尬境地的可能性,在不断推拉与博弈中完成了利益结构互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策略不仅维持了自身的自主性,也保障了相亲对象的利益,个体不至于完全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相亲过程中的“推拉之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 考 文 献]

- [1] 红 网:《结婚率已连续八年下降“70后”“00后”“婚恋观”的变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239459796273248&wfr=spider&for=pc>
- [2] 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 [3] 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 [4] 贾志科 王思嘉:《当代青年婚恋研究述评与展望(1985-2018)》,载《青年探索》,2019年第6期。
- [5] 叶金珍 王 勇:《相亲结婚真的靠谱吗——基于CFPS2014数据的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 [6] 刘子曦 何姣姣:《网络为媒:数字时代婚恋匹配的基础设施形态及运作逻辑》,载《浙江学刊》,2023年第5期。
- [7][29] 翟学伟:《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关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 [8] Connidis, I. A. Exploring Ambivalence in Family Tie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1).
- [9] 王 阳 马小雷:《催婚:现代社会家庭再生产的困境及其代际冲突——基于一位待婚女青年的生命历程研究》,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10] 贾志科 许荣漫:《集体相亲中参与主体行动策略分析——基于南京大型相亲会的观察》,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11] 黄 雨:《相亲者及亲属交往行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12] 刘 炜:《偏好变化与青年择偶匹配——基于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典型案例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 [13] 孙沛东:《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以知青父母的集体性焦虑为视角》,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
- [14] 曹慧中:《为谁辛苦为谁忙——讲述父母相亲会背后的故事》,载《青年探索》,2007年第2期。
- [15] 孙沛东:《“白发相亲”——上海相亲角的择偶行为分析》,载《南方人口》,2012年第2期。
- [16][42] 黄斌欢 严 航:《何以为家: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与家庭组建困境——基于成年转型困境的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2期。
- [17] 黄 丹 倪锡钦:《浪漫爱与现实婚夹缝下的新生代流动女性婚恋策略》,载《青年探索》,2020年第3期。
- [18] 祝平燕 王 芳:《返乡相亲: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择偶形态——以豫东S村为例》,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9期。

- [19] Jiang, Q. B. and Sanchez – Barricarte, J. J..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012, (1).
- [20] 孙 萍 李宜桐 等:《“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载《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1期。
- [21]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 洋 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 – 377页。
- [22]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 – 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 – 20页。
- [23] 熊万胜 李 宽等:《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来自一个大都市的经验》,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 [24] Houtman, D., Stef, A. and Willem de, K.. Paradoxes of Individua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Modernity, Burlington: Ashgate, 2011, pp. 14 – 15.
- [25] 解彩霞:《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载《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26] 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 [27] 阎云翔 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 [28] 王歌雅:《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30]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 [31] Zheng, J., Ho, PSY.. Contextualising Transforme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Using Adult Daughters’ Mate Selection as an Example, *Families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 2017, (3).
- [32] 李 煜 徐安琪:《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载《青年研究》,2004年第10期。
- [33][37]雷开春:《青年白领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中产地位身份威胁》,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 [34] 丁依然 董晨宇:《制造夫妻:中国形婚群体的剧班协作、达标表演与身份失调》,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6期。
- [35] 张 杰 马一琨:《从情境崩溃到情境再分离:社会 – 关系情境中的用户社交媒介实践——基于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 [36] 陈 晨:《熬夜: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8期。
- [38] 项江南:《“礼轻情意重”还作数吗?——城市青年情侣礼物互赠的性别化实践》,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6期。
- [39] 翟学伟:《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 [40] Zhou, L., Zhang, S. J.. How does Face as a System of Value – Constructs Operates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Mianzi and Lian in Chinese: A Corpus – Based Study. *Language sciences*, 2017, (12).
- [41] 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 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5页。
- [43] Yan, Yunxiang. 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16, (2).
- [44] Zhang, Y., Wang, J. X., Zu, Y. F. and Hu, Q.. Attitude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ward Aging and Living Independent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责任编辑:张 丹)